

山西大同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  
山西大同大学优秀著作资助出版  
山西大同大学专门史重点扶持学科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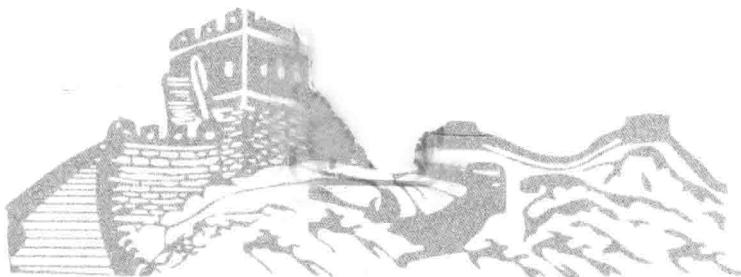
# 明代大同镇 边防体系研究

MINGDAI DATONGZHEN BIANFANG TIXI YANJIU

李海林/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山西大同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  
山西大同大学优秀著作资助出版  
山西大同大学专门史重点扶持学科成果



# 明代大同镇 边防体系研究

MINGDAI DATONGZHEN BIANFANG TIXI YANJIU

李海林/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大同镇边防体系研究 / 李海林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57-0736-6

I. ①明… II. ①李… III. ①边防—研究—大同市—明代 IV. ①E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7565 号

### 明代大同镇边防体系研究

著 者: 李海林

责任编辑: 任俊芳

出版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文印中心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736-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自序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大同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石器时代，这里就成为古人劳动之所，栖息之居。陶唐时分天下为九州，大同系冀州之地。春秋时为游牧部落林胡活动之地。战国时，初为代地，继之“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sup>①</sup>，成为赵国的边陲重地，大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sup>②</sup>。秦统一天下，废分封，置郡县，大同为雁门、代郡地。汉亦和秦朝一样。晋时，大同北部被鲜卑族占领，南部仍属雁门郡。北魏时为平城，大同作为北魏之都长达 97 年，历六帝七世，一度是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魏太和十八年（494 年）北魏迁都洛阳，于大同地置恒州，治所在平城，管辖六郡十四县，直至北魏孝昌二年（526 年），六镇之乱，平城遂废。大同历经战乱，隋重新统一全国，大同为马邑郡、雁门郡之地。唐分全国为十三道，开元十一年（723 年），改云、朔、蔚、代诸州属河东道。五代时，大同地方为后唐所占。后唐清泰三年（936 年），节度使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贿赂契丹，此后大同地属契丹。辽在大同置西京，成为陪都，“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sup>③</sup>，在当时占据很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辽西京大同府，是在北魏平城故址基础上修筑而成。金仍以大同为西京，在金攻打辽时，西京大同颇受重创，金占领之后，大兴土木，重新修建大同城。大同在辽

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 110，中华书局 1963 年，第 2885 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 81，中华书局 1963 年，第 2449 页。

③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 41，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506 页。

金之时,作为陪都,是非常重要的边防重镇,成为中原和少数民族联系的纽带,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元初,大同仍称西京,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西京道大同府为大同路。明洪武二年(1369年),攻取大同,仍为大同路,洪武七年,始改大同路为大同府,领四州七县。

大同北部是连绵不绝的阴山山脉,南麓余脉延伸入大同境内,在其北部形成诸多山丘,呈东北——西南走向,境内比较重要的山有断头山、方山、采凉山、白登山、武州山、弥陀山等。在这些群山之间形成众多谷地,成为大同镇通往外界的交通道路。其中,在大同镇北部形成御河河谷、兔毛河河谷两个重要河谷,其地处交通孔道,成为蒙古统治者南下的必经之路。御河河谷呈南北走向,位于大同镇城北部,由此向北,经由察哈尔右翼前旗、集宁,向西到达呼和浩特地区(古丰州),形成一条重要的道路——丰州道,成为蒙古诸部顺阴山南麓进入大同的重要道路。明初,“云内、丰州悉为内境,边圉宁谧者数十年,后乃多故也”<sup>①</sup>。尤其是嘉靖时期,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兴起,“在大同边外大青山昭君墓丰州滩住牧,西至河套,东至宣府洗马林一带,离边三百余里”<sup>②</sup>,其“筑城于丰州滩,採木架屋以居,谓之板升,是为西土默特,隆庆间,封俺答为顺义王,名其城曰归化”<sup>③</sup>。俺答由丰州道不断南下,侵扰大同、浑源、灵丘,及至太原,并东入宣府,进犯京师,给明朝带来很大压力。兔毛河河谷位于大同镇城西北部,右玉县西,源出平鲁县,南绕流府城西分为二:“一会南河,(右玉县南二十里)东流经云阳堡东五十五里,入左云县西北;一北流经杀虎堡出口外,西流入乌兰穆楞河。”<sup>④</sup>兔毛河口虽“最为要卫”<sup>⑤</sup>,但位于兔毛河谷地的杀胡口,更为重要。明军为抵御蒙古部族的南侵,多次从此处出兵,因而取名为“杀胡口”。兔毛河由南向北贯穿其中,形成一条宽200多米、长3000多米的天然关口,历来为蒙古与山西的交通要冲。由杀虎口向西北,有道路通往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由杀胡口沿兔毛河谷过威远卫、平虏卫,到井坪守御千户所,经朔州可到达宁武关,或西南行,沿偏关河到达偏头关。

<sup>①</sup>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中华书局2005年,第1993页。

<sup>②</sup> (明)项德桢:《名臣宁攘要编》,萧大亨:《北虏风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11册,第643页。

<sup>③</sup> (清)和珅:《大清一统志》卷124,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第1页。

<sup>④</sup> (清)和珅:《大清一统志》卷111,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第2页。

<sup>⑤</sup> (清)觉罗石麟:《山西通志》卷12,雍正十二年刻本,第6页。

大同悠久的历史及重要的战略军事位置,决定了其在历史上的不平凡,“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就是对大同曾经辉煌的经典概括。1982年,大同成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本着恢复历史文化古都的目的,大同在城市建设与文化建设上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系列工作。笔者在读硕士期间,主要研究方向是明清地方史,重回工作岗位后,研究大同地方史成为兴趣所在。对于大同历史,北魏、辽金时期的大同研究成为多数专家学者的兴趣所在,而对明清时期的大同关注不够。笔者在经过大量搜集资料及再三思量后,认为大同镇边防体系的研究尚薄弱,有许多问题需要廓清和深入,因此确定了明代大同镇边防体系研究这个选题。内容包括防御体系、指挥领导体系及粮饷供应体系等方面。

纵观整个明朝,这几个方面发展与大同镇整体形势变化息息相关。通过对防御体系、指挥领导体系及粮饷供应体系等方面分析论述,有助于直观、具体地了解大同镇在不同时期针对蒙古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能凸显每个时期在这几个方面的特点。反之,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亦能折射出当时大同镇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以及明政府对大同镇的管理情况。有明一代,明廷在大同镇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军堡,同时在镇城北面陆续修建了三道边墙。随着卫所、军堡的大量修建,明政府为了协调管理,增强策应与救援能力,逐渐形成分路防守体系。指挥领导体系亦不断完善,不停改革。在粮饷供应体系方面,从军屯、民运、开中、京运各个渠道集中供应边防。大同镇的边防建设表面上非常完美,但在明朝大部分时期里,明蒙之间明朝始终处于被动消极的弱势地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通过对大同镇边防体系系统研究,不仅能够有助于推进明代大同镇的研究,而且对明朝倾尽全国之力边防依然败坏的原因通过个案研究做出有益的探索。

## 二、学术史回顾

明朝北部边防问题一直是时人关注的一个焦点,因此早在明朝就出现了有关北部边防的著作。成于嘉靖时期的《九边图考》、《皇明九边考》、隆庆时期的《九边图说》等一批著作,主要是介绍九边的形势地理以及兵马钱粮,自然也涉及大同镇,但是记载比较简单。万历年间,王士琦所撰《三云筹俎考》、杨时宁所撰《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这两本书主要介绍万历年间大同镇所存之城堡概况及边外蒙古部族的情况,对研究大同镇有重要参考价值。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掀起了九边研究高潮。

### (一)与九边相关的研究成果

#### 1. 关于九边军镇体制研究

肖立军先生《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sup>①</sup>,作者用省镇营兵制的提法概括明代中后期京营以外地区兵制,并从军队、兵役、指挥体系、编制、军饷这五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论证。一、关于军队,作者主要以明朝北边为考察对象,详细介绍了标兵。标兵是总督、巡抚、总兵等亲统之兵,渊源于亲兵,但营兵对其影响更大,并且详细地考辨了标兵始设时间。二、兵役,省镇营兵制之兵源主要来源为卫所和募兵。三、指挥系统,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写了文职指挥系统,关于总督,作者考察了各总督首设时间、任务及地位作用。对于宣大总督,作者认为“尚书石璞总督或总理宣大军务”这一说不准确。认为“较早负责宣、大两镇实际军务的文臣是王越”。关于巡抚,作者考察了巡抚的设置演变及职权的变化。随后又考察了守、巡、兵备道等。其次写了武将指挥系统。总兵,分为征伐总兵和镇戍总兵两种,分阶段考察了总兵之职权地位。总兵之下又有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操守、把总、提调、备御,作者逐级分层一一加以介绍。最后为监军系统,主要讲述了巡按、镇戍内臣等。四、编制方面,重点考察了明代中后期省镇标、营兵及其营制的形成。作者主要探讨明中后期省镇镇戍营制的形成和发展,重点分析北边等地营制的主要内容及形成原因。五、后勤供应,主要写了武器装备和粮饷供应这两个方面。关于粮饷主要写了军饷的来源、管理及发放这几个方面。军饷的来源主要有军屯、民运、京运、开中、赎罪、开纳、徭役和加派等项。北边军饷的来源主要有军屯、民运、开中、京运和赎纳,作者认为军屯和民运自洪武以来就是九边军饷的两大支柱,并且提出军屯只是在个别时期、个别边镇足以供应边饷。认为《明史》、《明会典》“所谓明初军屯足供军需的记载并不准确”。通过对本书的阅读,读者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明代省镇营兵制。

肖立军先生另一著作《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sup>②</sup>,该书以九边为研究切入点,主要探讨明代中后期九边的兵制,着重讨论了明代中后期的九边镇戍兵制、九边文官武将的职掌及上下左右的关系和九边的后勤供应与防御工事系统。关于镇戍兵制,作者涉及了九边的形成标准的问题,认为:“一般说来,边方都司或镇守武

<sup>①</sup> 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sup>②</sup> 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将的设置表明该镇初设，而巡抚一职的定设则表明此镇最后形成，因为巡抚是各镇的文官之首，不设巡抚说明此镇还不够典型。”文中提到大同镇洪武二年二月张兴祖率士卒戍守大同，是边将镇守大同之始。

赵现海《明代九边军镇体制研究》<sup>①</sup>，该文主要写了明代九边大将镇守制度、塞王守边制度、总兵镇守制度和督抚制度。通过分析讨论军镇体制的确立及其发展，认为九边军镇在权力不断增重的同时，内部制约机制亦逐渐发展，由总兵独大到文武相制最后形成以文制武这样一个格局。

以上几本著作，以九边的军镇体制为纲，都深入探讨了九边总督、巡抚、总兵等的设置时间、职权范围以及历史地位。

## 2. 关于九边设立的标准和时间

范中义《明代九边形成的时间》<sup>②</sup>，作者首先确定称镇标准，认为要有武职大臣，即总兵的镇守，而且要有巡抚的提督，但在初设镇时，二职不一定完全具备，特别是文职大臣一般设置较晚，因此每镇都有一个初设和最后完成的问题。根据这个标准，作者认为大同镇初设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完成于成化十年（1474年）。并且，作者认为《九边图论》、《皇明九边考》和《明史》所讲九边形成的时间顺序是不对的，无论总兵官的设置，还是各镇的建成，其顺序都是初设辽东、甘肃、宁夏三镇，继设蓟州、大同、宣府、延绥四镇。

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sup>③</sup>，作者主要以《明实录》为基础，参考其他史料，确定了“九边”设置的准确时间。文中认为大同镇设于永乐十二年，因为江阴侯吴高在永乐元年（1403年）到永乐十二年（1414年）虽然长期驻守大同，但其间从未带总兵官衔，所以，作者认为永乐七年（1409年）大同称镇是站不住脚的。

胡凡《明代洪武永乐时期北边军镇建置考》<sup>④</sup>，作者从学界存在的各种关于“九边”设置的观点以及关于称镇的标准这两个问题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考究九边军镇的建置必须从明朝初起即洪武时期开始，第一要结合都司卫所的军事防御体系进行考察；第二要结合领敕行事的军事长官的任命及其责任来考察，至于其是

<sup>①</sup> 赵现海：《明代九边军镇体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5 年。

<sup>②</sup> 范中义：《明代九边形成的时间》，《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 年第 4 期。

<sup>③</sup> 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第 3 期。

<sup>④</sup> 胡凡：《明代历史探赜》第 3 编《明代洪武永乐时期北边军镇建置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否成为总兵或总兵官则在其次;第三要结合明代当时人对军镇的称呼和习惯看法来验证。”据此,作者认为大同设镇时间为洪武二年二月(1369年),“大将军徐达遣都督同知张兴祖将宣武、振武、昆山三卫士卒守大同。”

### 3. 关于九边的卫所、堡寨

王杰瑜《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sup>①</sup>,该文首先论述了军事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把军事聚落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以卫、所为形式的高层次军事聚落;其二,以堡寨为形式的中间层次的军事聚落;其三,以屯军堡、乡堡和墩台为形式的低层次的军事聚落。作者又论述了山西北部聚落的变迁,分析了变迁的原因,最后指出,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因政治、军事因素的产生而存在,却没有因政治、军事因素的消失而消失,而是通过功能的转化大量地保存下来,成为山西北部地区迅速得到开发的重要因素,也由此基本上奠定了今天的行政建制。

李严《明长城九边重镇军事防御性聚落研究》<sup>②</sup>,作者从建筑学的角度考察军事聚落分布与军事防御体系的关系,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层次关系,逐级分析论证。作者通过对长城全线整体时空分布——军镇层次的防御性研究——军镇内部聚落级别与规模关联性研究——聚落内部构成要素的逐级研究,进而探寻九边重镇军事聚落的总体空间分布规律。并对军事聚落选址以及内外防御功能进行详尽的分析。同时,通过对各层次军事聚落特征的介绍,揭示出军事聚落的层次与城市规模的内在关联,最后展开军事聚落外部与内部构成因素的研究。这是一篇集建筑学与历史学于一体的论文,也即作者所提到的建筑史学。

李哲《山西省雁北地区明代军事防御性聚落探析》<sup>③</sup>,该文主要通过阐释雁北地区卫所的兴起、发展沿革,重点说明这些军防城堡的建筑特点,最后延伸讨论以军事为中心的聚落发展。

关于卫所的设置,主要有郭红《明代都司卫所设置研究》<sup>④</sup>。卫所按照是否领有实土分为实土卫所、非实土卫所两种类型,但还有一些非实土卫所,由于其亦具有实土卫所的特征,作者将其定义为“准实土卫所”。该论文主要内容为介绍明代各都司卫所的建置沿革过程,重点分析实土都司卫所的变迁。该文第一章即“山西

---

① 王杰瑜:《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1月。

② 李严:《明长城“九边”重镇军事防御性聚落研究》,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③ 李哲:《山西省雁北地区明代军事防御性聚落探析》,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④ 郭红:《明代都司卫所设置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

行都司建置沿革”，作者首先按照时间顺序写了各卫所的建置时间，进而对都卫、行都司及所辖卫所逐一考证。最后作者按照卫所的分类，分析了山西行都司各卫所的性质。该文对山西行都司卫所的建置沿革研究相当到位，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有重要参考价值。

#### 4. 关于九边粮饷的研究

九边的后勤粮饷也是研究九边的一个重要课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全方位的展开研究。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sup>①</sup>，该书主要介绍了明代军屯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分为两编：上编，明代军屯的制度和作用，主要内容是军屯的历史渊源、建置、经营、旗军拨屯比例、军余顶种、军屯地土、军屯分地、屯田子粒、军屯作用等等，就涉及军屯的种种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探讨；下编，明代军屯上的生产关系，主要内容有承当军差的军户，执行军差屯军和军余，屯军所遭受的封建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以及屯军怠耕、典卖屯地、投献屯地、逃亡、反抗等形式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寺天隆信《明代山西商人研究》<sup>②</sup>，该书主要讨论十四至十七世纪的商人以及商业资本在中国的形成过程及存在形态，考察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山西商人”，而作者在重点写山西商人之前用了大量篇幅写了明代北部边塞军事消费地区的经济结构，作者主要探讨了屯田粮、民运粮、盐法、京运年例银这四项，认为随着时代的演变交替，这四者在边饷总额中各自所占的数量上的比重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关于民运粮作者主要写了三个问题：一为民运粮的派征地，二为在边饷体系中的比重问题，三为民运粮折银问题。通过分析考察，作者对这些问题得出了如下答案：民运粮是华北诸省负担的，在边饷中占据最主要的部分；民运粮的折纳是为了减轻输纳的困难而实行的，部分纳银是在正统年间开始，而全纳则始自正德年间，不过交纳实物一直没有中断，并且各边镇实行纳银制的时间均不一样。关于京运年例，作者首先分别考察了各边镇年例银开始支出的时期与数量。作者认为京运年例银的解边始于正统年间。弘治、正德年间的京运年例银的总额不超过五十万两，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以后，年例银急增，超过了二百万两，万历年间达到了三百万两乃至四百万两。关于屯田，作者主要分析了屯田粮之数量，同时指出屯田粮在宣

<sup>①</sup>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2009年。

<sup>②</sup> 寺天隆信：《明代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1986年。

德正统年间数量减少，并非单纯由于屯田制度的崩溃或生产规模的缩小而引起，改变纳粮规定，也是一个原因。关于开中，作者主要写了开中法的概况、开中法的实绩、在开中法实施过程中商人的活动等几个方面。

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sup>①</sup>，本书以嘉靖十年（1531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研究时段，以五项系统性的边镇粮饷史料为依据，探讨明九边十三镇的军马钱粮数，旨在说明这段时期边镇粮饷的结构与变动趋势。正如徐泓在序中所言，该书有三个优点：一、作者选取边镇粮饷这样一个明史、军事史及财政史方面的重大问题，意义重大；二、由于作者拥有经济学专业的素养，因此在解读史料和分析方法时，能够拥有独到的见解和发现；三、在论述边饷各项问题之余，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阶段有识之士对边饷各问题之言论。

全汉升《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sup>②</sup>，作者主要对北方的六个边镇有明一代的米粮价格做了一个统计。通过对这个统计的分析，作者认为：一、北方米粮价格自明中叶以后呈不断上升趋势；二、明代北方边镇米价呈季节性变动，一般米价在秋收后比较低，到了春天则要高一些；三、北边各镇的米价，大部分时间都较内地为高；四、地理上比较接近的边镇，米价升降的趋势大体上都很相似。并且，作者重点分析了中叶以后米价长期上涨趋势的原因，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方面做了阐述。供给方一是土地荒欠，另一是军屯商屯的废弛；从需求方来说，则是因为年例银的增加。

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sup>③</sup>，该文主要从制度和来源两方面探讨了明中叶太仓银库岁入银两激增的原因。作者分析了太仓银库中的几种赋税项目，尤其是那些足以影响太仓银数增加的项目。认为盐利、商税和粮草折色是太仓银库的主要收入。

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sup>④</sup>，作者认为明中叶后太仓岁

<sup>①</sup> 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sup>②</sup> 全汉升：《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新亚学报》1970 年第 9 卷第 2 期，第 49—96 页。

<sup>③</sup> 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2 年第 5 卷第 1 期，第 123—157 页。

<sup>④</sup> 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3 年第 6 卷第 10 期，第 169—244 页。

出指数,大体上呈长期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个上升是“参差不齐、忽高忽低、如同波浪式的不规则地前进。”并且在太仓银支出项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军费支出。在从明代正德十三年以后的一百多年,作者搜集了四十六个不同年份的同时有岁出和岁入银数的记载,其中只有正德十三年、万历五年、二十一年、三十年、天启五年、崇祯四年、崇祯七年这七个年份岁出银额小于岁入银额,其他的年份均岁入少于岁出,一直处于财政赤字状态。

张松梅博士《明代军饷研究》<sup>①</sup>、苏新红博士《明代太仓库研究》<sup>②</sup>王尊旺博士《明代九边军费考论》<sup>③</sup>等均在不同方面深入地探讨了九边粮饷。

### 5. 关于明蒙关系

对于研究明蒙关系的文章及著作非常多,在此简单列举一二:

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sup>④</sup>,该博士论文分为两章,第一章为明朝与蒙古的双边政策,第二章为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体制。对于明蒙关系,作者以土木之变和俺答封贡为界限,划分为明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讨论。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有力的论证,总结了不同阶段明蒙双边政策的特点。第二章首先探讨了设镇标志,作者以为“不应简单地以总兵官和巡抚的设置作为设镇的唯一标志。就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诸镇而言,设镇应以洪武时设立都司、卫所为标志,武臣镇守或总兵官的设置则应是称镇标志。”在这里作者提出了“设镇”与“称镇”的区别。作者认为大同都卫设立也就是大同镇设镇之始,江阴侯吴高永乐元年(1403年)镇守大同为大同镇称镇时间。其次简要地探讨了九边的管制及防御体系。

唐玉萍《明朝嘉万时期对蒙政策谈论》<sup>⑤</sup>,作者以嘉万时期明朝对蒙政策为研究目标,这一时期是一个“风云多变、政局起伏、改革强劲、疆域危殆的大动荡年代”。笔者通过对嘉万时期对蒙政策的探讨,认为明朝嘉万时期对蒙政策调整得当,使得明蒙关系得以改善,明朝边境相对安定。

<sup>①</sup> 张松梅:《明代军饷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年。

<sup>②</sup> 苏新红:《明代太仓库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9 年。

<sup>③</sup> 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厦门大学博士论文 2011 年。

<sup>④</sup> 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论文 2004 年。

<sup>⑤</sup> 唐玉萍:《明朝嘉万时期对蒙政策谈论》,《社会科学辑刊》第 6 期。

唐丰娇《洪武至宣德时期明朝对蒙古的经略》<sup>①</sup>,该博士论文主要依据时间的动态变化探讨洪武至宣德时期明朝对蒙古的经略。作者不仅关注明朝的内部环境和蒙古的内部变化,也重点论述与分析了明朝和蒙古与周边邻近民族的关系。

## 6. 其他

关于九边的研究除了上述几个方向外,学者们还从其他角度给予深入研究,如下:

刘景纯《宣德至万历年间蒙古诸部侵扰九边的时间分布与地域变迁》<sup>②</sup>,作者首先系统地分析了蒙古诸部南犯九边的时间分布,共包含两个方面:一为侵扰活动在整个时段中的年份分布。总的说来,宣德到嘉靖年间,蒙古部族对九边的侵扰活动,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万历年间,蒙古诸部日渐衰微,对九边地区的侵扰逐渐减少,并且作者强调提出“就蒙古诸部侵扰的历史来讲,说宣德以后蒙古诸部侵扰日渐增多,边备日益紧迫,则更符合历史事实。”同时,作者认为,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后的三十一年间是蒙古诸部侵扰的高峰时期。二是侵扰月份分布。首先,作者认为蒙古诸部的侵扰活动在一年当中各个月份的分布总体上是较为均衡的。而秋季侵扰次数相对较多,尤其是大规模的侵扰活动分布最为显著。其次作者又分析了蒙古主要部族侵扰九边的时空特征与地域变迁。作者提出随着蒙古诸部族势力的消长、变化,空间分布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从鞑靼阿鲁台到瓦剌也先,时间是从宣德元年(1426年)至景泰七年(1456年)三十年的时间,是明朝转攻为守的最初三十年。在这三十年时间里的前二十年,主要侵扰地点为辽东边境、甘凉一带。以瓦剌为主体的侵扰活动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始,频繁侵扰的地区是大同、宣府二镇。第二个时段,从鞑靼孛来到毛里孩等,时间是从天顺元年(1457年)至成化十八年(1482年)。景泰五年(1454年)以后,瓦剌势力衰微,鞑靼孛来继起,随后鞑靼各部迭相称雄,对明的侵扰不绝如缕,九边危机日趋严重。孛来频繁侵扰的地点分布在延绥镇、宁夏镇和甘肃镇沿边。毛里孩侵扰的地点主要是在延绥镇。成化十年(1474年)至十八年(1482年),鞑靼诸部侵扰的方向移向大同、宣府一带。第三个时段,小王子称雄时代(1483年至1533年),其

<sup>①</sup> 唐丰娇:《洪武至宣德时期明朝对蒙古的经略》,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2010 年。

<sup>②</sup> 刘景纯:《宣德至万历年间蒙古诸部侵扰九边的时间分布与地域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2 期。

主要侵扰地点在大同、宣府二镇。第四个时段，鞑靼吉囊时代（1534年至1541年）其侵扰的地区主要有一为延绥、宁夏、固原，二为大同宣府。在宣大地区约有八次大的侵扰，六次分布于嘉靖十五年以后。第五个时段，俺答称雄时代（1542年至1570年），这一时期的侵扰大约有八十余次，这种频繁的侵扰，将明代北部蒙古诸部侵扰活动推向最高潮。侵扰的主要地区是大同、宣府二镇。第六个时段，土蛮、河套、松山诸部为主的侵扰，时间从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此时分为两个阶段，一从隆庆五年（1571年）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这期间以土蛮和泰宁部为主，对于辽东镇及其附近较有影响的侵犯有二十多次；二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此时一向归款纳贡的河套诸部又开始频繁侵扰。作者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分析，总结了侵扰明朝的五大核心地域集团，提炼出了九边侵扰活动由鞑靼部自九边东、西两端而起，而结束时又出现东、西两个地域侵犯的局面。同时，作者又分析出正统十四年（1449年）以后，瓦剌集团对宣府、大同二镇的重点侵犯，揭开了宣大边地危机的序幕。最后，作者总结了蒙古诸部侵扰九边的空间等级差异。作者通过分析，总结了三个等级的主要侵扰区域，第一个等级侵扰区，为辽东镇和大同镇，受侵扰次数最多；第二个等级侵扰区，是宣府镇和延绥镇；第三个等级为甘肃、宁夏、固原、蓟镇和偏关诸镇，是受侵扰次数较少的几个区域。通过作者整体梳理分析，我们对于蒙古对九边的侵扰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且对正确认识明朝北方军事防御的布局与特征也具有重要意义。

刘景纯《明代九边的军事策应与救援》<sup>①</sup>，作者首先认为策应、协防和救援是防御布局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在既成防御布局基础上不断补充和完善的重要内容。在明朝初期，只是一个静态性分区防御，区域之间协防和救援能力薄弱。基于此，必须完善军事布局，不断增设防御或协防据点以及调整防御区域划分。因此，正统以后，各边镇开始不断增加卫所堡寨，同时进行内部的分区划分，形成分区管理的“分守”制度。这样既有助于提高分守区的防卫能力，又增强了分守区内部协防和救援的有效性。但是，分区防守亦不是完美的，明政府只能在既有布局的基础上，加强总兵官之调度策应的作用，进一步实施总督管辖下的相邻诸边的一体防御。随后，作者又分析了策援力量的基本构成与相互策应的基本原则。策援的主要力量为京军、游兵、骑兵等。策援制度主要有就近策应、巡边哨备策应地方、奏请策应

<sup>①</sup> 刘景纯：《明代九边的军事策应与救援》，《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与救援、区域整体防御与总督等提督调遣,有效组织策应、救援。最后,着重写了边际策应救援的基本范式,即指相邻和相近诸边在长期策应和救援实践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形式。九边主要形成了四个区域:1. 宁夏、延绥、固原三镇;2. 甘肃镇;3. 大同、宣府与偏关镇;4. 蓟镇与辽东镇。

刘景纯《明代前中期九边区域防御形态的演变》<sup>①</sup>,作者主要写了洪武时期防守区的初步构建与基本结构,基本特点是北疆防御由关塞、卫所进而以省区为基本单位,以都司和行都司为基本结构,形成基本的防御结构体系。永乐以后,以九边为中心的区域防御新模式得以确立。正统以后,由于蒙古入侵日增,以九边为中心的防御体制略显捉襟见肘,鉴于此,明代调整了防御体制,在各边内部实行分区防守。正统时期,大同镇分为东、中、西三路,嘉靖时期,分为东、中、西、北四路,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新平路、东路、北东路、北西路、中路、威远路、西路、井坪路等八个分区,各由参将驻守。最后,作者认为这种大防区与分防区相结合的形式,后来不断发展和完善,最终成为明代九边区域防御最稳定的形式。

萧国亮《明代后期蒙汉互市及其社会影响》<sup>②</sup>,该文从商业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对明代后期隆庆、万历年间的蒙汉互市进行历史考察,揭示互市贸易的发展状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余同元《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sup>③</sup>,该文对九边地区民族贸易市场的设置及其市易状况分边分区进行了考察,并且论述了明后期民族贸易市场的性质变化,更进一步论述了其影响。作者认为,互市贸易促进了农牧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更重要的是结束了长城两边长期的内外对峙和分合无常的局面,从而为中国北部在清代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王继光、孙建军《明代“九边”宣大军事防务区的形成》<sup>④</sup>,作者主要分析明初、中期北边防线逐渐南移的态势,从而使宣、大防务压力增加,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加强对宣大的协调作战能力,遂设总督于此,并简单的论述了宣大总督的权力以及成效。宣大总督的设立,标志着宣大地区有了一个居中调度和支配应援力量的机构,促成了宣大防务区的建立。

<sup>①</sup> 刘景纯:《明代前中期九边区域防御形态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

<sup>②</sup> 萧国亮:《明代后期蒙汉互市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2期。

<sup>③</sup> 余同元:《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sup>④</sup> 王继光、孙建军:《明代“九边”宣大军事防务区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韩帅《明代定设时期宣大总督若干问题研究》<sup>①</sup>,作者认为宣大总督定设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主要写了宣大总督的驻地、助手、标兵、职权等几个问题。作者通过考证,认为宣大总督驻地除朔州、阳和外,还有其他几个相对固定的驻地,并且涉及了前人未曾研究的总督的助手问题,关于总督标兵,作者也做了详细的考察,最后论述了前人较少涉及的宣大总督的钱粮方面和一定的自行赏罚的职权。

对于九边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军镇体制、后勤军饷、堡寨聚落、九边设立标准时间、明蒙关系等方面着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大同镇个体研究相对于九边整体研究而言,虽然没有大规模展开,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年来,学界对于大同镇之研究文章主要有以下:

高春平《论大同在明代北部边防中的地位》<sup>②</sup>,作者通过分析总结出大同的边镇地位在明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随之梳理了有明一代大同镇在北部边防中所处重要地位。最后,作者论述了明设大同镇的作用及影响。大同镇的设立不仅对明代北部边防的巩固发挥巨大作用,而且对大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

杨国华《明大同镇防务研究——以败虎堡为例》<sup>③</sup>,该论文简要写了大同镇职官建设,论证了大同镇在明代边防中的地位。同时写了大同镇防御体系的修建,重点涉及边墙、墩台、城堡。重点写了败虎堡,详细分析了败虎堡遗存的碑刻,最后论证了把汉那吉封贡。

翟禹《明代大同镇之败虎堡考略兼论败虎堡石碑题字“永宁”所体现的蒙汉关系》<sup>④</sup>,该文主要介绍了败虎堡的概况,重点阐释了在败虎堡发现的两块石碑之含义。

张永江《明大同镇长城、边堡兴筑考》<sup>⑤</sup>,该文探讨了明代大同地区的边墙、城堡的兴筑过程,并且辨析了“大边”、“二边”的概念。作者认为,明代不同时期存在着位置、走向不同的大边和二边,明初的大边、二边应在今内蒙古境内,现存的晋蒙

<sup>①</sup> 韩帅:《明代定设时期宣大总督若干问题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1 年。

<sup>②</sup> 高春平:《论大同在明代北部边防中的地位》,《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 年第 1 期。

<sup>③</sup> 杨国华:《明大同镇防务研究——以败虎堡为例》,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 2008 年。

<sup>④</sup> 翟禹:《明代大同镇之败虎堡考略兼论败虎堡石碑题字“永宁”所体现的蒙汉关系》,《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 年第 1 期。

<sup>⑤</sup> 张永江:《明大同镇长城、边堡兴筑考》,《鲁东大学学报》2010 年第 5 期。

交界处的长城是明嘉靖后形成的新“大边”，其位置在明初的二边之内。后代资料中所以出现这种大边、二边颠倒错位的情况，一是正统以后明蒙双方攻防形势的改变，造成明朝防区的大幅收缩；二是成化以后的屡次异地重修边堡造成的影响。

尚珩《明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研究》<sup>①</sup>，作者以“土木之变”与“俺答封贡”为限，分为前、中、后三期论述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的发展变化。在行文过程中，作者又按照具体的防御体系的变化分为七段来详细论述。本文主要写了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之卫所、城堡边墙的修建发展过程以及现存情况。作者绘制了大量的表格与地图，从而使读者更直观地了解了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的过去与现在。该文之特色就是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结合田野调查的收获，对其修建背景和防御体系进行整体的、动态的、立体的研究，以长城墙体和城堡的变迁和现存状况为线索，勾勒出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建设、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

张鹏《明代山西行都司设置军事地理研究》<sup>②</sup>，首先，作者通过对山西行都司的地形、地貌、河流、气候和交通道路等几个方面的勾勒，展现出了明代山西行都司的空间特点及战略意义。关于地形地貌，“两山夹一川”的地理特点使雁北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是明朝在此设立山西行都司的地理基础。而由于山西行都司北部相对平缓，无崇山峻岭之险，极利于蒙古骑兵入犯，成为山西行都司设防的重点地区；关于河流，山西行都司境内河流众多，既有利于卫所屯田，又是卫所的天然屏障。关于气候，十五至十七世纪，全国气候十分寒冷，而大同地区地处塞北，本就干冷，因此明时气候变得更加寒冷。关于交通道路，作者主要介绍了大同北通蒙古、东下北京、南接太原之路。其次，论述了明初山西行都司卫所格局。作者按照西北、北部、南部这样一个方位结合军事地理概况，分析了山西行都司初期所设之卫所及其战略位置。最后，写了明后期山西行都司设置布局的变化。嘉靖年间，明蒙关系紧张，大同几乎无岁不警。明朝积极改善山西行都司防卫格局，有效抵御了蒙古诸部的人犯。

王蕊《明代山西行都司建置研究》<sup>③</sup>，作者选取明代山西行都司的建置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复原和再现明代山西行都司的军政建制和军政管理，并进一步探讨

<sup>①</sup> 尚珩：《明大同镇长城防御体系研究》，山西大学硕士论文 2010 年。

<sup>②</sup> 张鹏：《明代山西行都司设置军事地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10 年。

<sup>③</sup> 王蕊：《明代山西行都司建置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0 年。